



2018年是麋鹿科学发现一百五十三周年,而科学发现的地点即麋鹿模式种产地就是北京南海子。在北京南海子这块神奇的土地上,麋鹿这个物种得到了真正的拯救,其失而复得的经历,举世瞩目,不仅实现从国外到国内的回归,更实现了从人工到自然的回归,堪为中国、也堪为国际保护动物的成功范例,而且这种动物背后所蕴含的国际性、科学性以及博物学史的内涵也相当丰富,不然,麋鹿为什么又叫“戴维神甫鹿”呢?

麋鹿是怎么在南海子“迷路”又回归的

□主讲人:郭耕

发现麋鹿

麋鹿又名戴维鹿或大卫鹿,俗称“四不像”,是一种极富传奇色彩和物种研究价值的哺乳纲偶蹄目鹿科动物。

1865年,即清同治四年,法国神甫阿芒·戴维在北京南部考察动植物。走到清兵把守的皇家猎苑——“南苑”外,戴维隔墙远望,发现这里生活着一种奇异的鹿,角似鹿非鹿,蹄似牛非牛,脸似马非马,尾似驴非驴,勾起了作为博物学家的戴维的强烈探奇欲望。他买通了大清皇家猎苑的官员,于1866年初,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,他终于靠贿赂守卫猎苑的大清军士,以20两纹银的代价,得到了两套完整的麋鹿头骨角的标本,并于当年从海路运到法国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。

经过巴黎自然博物馆米勒爱德华馆长的鉴定,获得令人吃惊的结论:戴维带来的动物标本竟然是分类学上的新属、新种,体型如此之大的哺乳动物被戴维发现,从而载入世界动物学史册,戴维由此而获得与麋鹿同名的殊荣。当然,不是戴维神甫改名叫了麋鹿,而是麋鹿的外文名称被称为“戴维神甫鹿(Pere David Deer)”。

据说,在法国公使馆的帮助下,戴维还得到三只活的麋鹿,一并送往法国。

为纪念第一个发现者,精确地说应是科学发现者,便将麋鹿的洋名称做了“戴维神甫鹿”(Pere David's deer)。其实,最早目击麋鹿的外国人不是戴维神甫,而是另一个叫张诚(J.F.Gerbillon)的法国人。早在戴维来到中国之前的1687年,作为最早在华传教的法国耶稣会五教士之一的张诚,就到过南苑,窥视过这个皇家猎苑中的动物,只是时值隆冬,观察得不真切。有别于其他鹿种,在冬尽春来之际,麋鹿的角完全脱落了,张诚便草率地把这些“四不像”记录成了“野骡”,但是,就是这个记录,为富于探究精神的戴维,提供了一丝可贵的线索。

1865年,戴维作为又一个法国人,便是带着张诚的模棱两可的记载,来到北京南海子的。同是这个大清猎

苑,皇家禁地。当年,戴维虽然从高高苑墙的墙头张望,发现共有麋鹿约120只,看清麋鹿乃是非凡之物,却一直无法获得,出于一个博物学家的执着,或者说是一个覬覦者的贪婪,反正,戴维是惦记上这个他叫不上名字的、以为是驯鹿的某个类别的、“四不像”动物了。

说麋鹿发现一百五十三周年,一定要加上“科学”发现的定语,毕竟,物种科学发现的命名规则是由西方人制定的,但麋鹿早已被中国先民所发现、所认识,这乃是一个不争的事实,麋鹿在中国文化中可谓源远流长:周朝灭纣,姜子牙的坐骑是麋鹿;楚大夫屈原有“麋何食兮庭中,蛟何为兮水裔”之辞;周朝的青铜器,汉代的瓦当……麋鹿的形象,栩栩如生,各朝各代有关麋的记载、描述不绝于书,全唐诗中可以找到关于麋鹿的诗句近百;清乾隆皇帝更有“麋鹿解说”之文刻于麋角,甚至中国道教的道观中还能见到麋鹿之像。

麋鹿的兴衰荣枯又与祖国的命运紧密相连。野生的麋鹿在明清时已消失,其原因尚无准确考证。

麋鹿离家

1900年11月10日,戴维神甫在巴黎过世,享年74岁。无巧不成书的是,以他名字命名的麋鹿,同是在这一年,于中国本土灭绝,灭绝地就在当年因戴维考察麋鹿而成为麋鹿模式种产地的——北京南海子。

可以说,令戴维始料不及的是,因为他的引荐,麋鹿作为硕果仅存的一群,因为被引种到了欧洲,后来都被收藏于英国的乌邦寺庄园,才免于全部灭绝的厄运。1896年永定河洪水泛滥,南海子的麋鹿仅余20~30只。1900年,八国联军攻入北京,洪水战乱,雪上加霜,南苑遭劫,覆巢之下无完卵!瑟瑟秋风中,德国军队追杀义和团,长驱直入,闯进了昔日的禁地:南苑。

苟延残喘的麋鹿种群在战火中遭到灭顶之灾。从此,作为麋鹿故乡的中国,彻底没有了麋鹿(作为残存者的最后一只麋鹿是1920年死于西郊万牲园,据说江苏滩涂也有保存个体

的记录,但均非种群,作为中国麋鹿种群消失的地方就是北京南海子的),而不幸中的万幸,如果不是戴维的引荐,麋鹿不会在英国乌邦寺一息尚存,这且算是西方人对劫掠中国生物资源的一种赎罪和补救吧。

戴维当年的中国之行,可谓硕果累累,带走大量标本。

戴维在1874年离华之前,在法国外交人员的协助下,陆续将活的麋鹿运至欧洲的一些动物园,既丰富了这些动物园的展览内容,更为麋鹿的劫后余生、种群延续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。

他在北京南海子采集的麋鹿,被命名为“戴维鹿(David deer)”;他在四川宝兴采集的珙桐,被命名为“戴维树(David tree)”;同样在宝兴采集的熊猫,被全世界称为Panda,在中法交流史上,堪称独树一帜,在生物学考察史上,可谓殊荣无上。

一个世纪前到了欧洲的麋鹿,被放在动物园中圈养,但由于没有湿地环境,范围又很小,所以非但没有繁殖,反而一只一只地死去。

此时,英国乌邦寺的主人福特公爵将世界上仅存的18头麋鹿收集到自己的庄园里,庄园很大,麋鹿处于半野生状态,且与原来的栖息环境相宜,使濒于绝迹的麋鹿又奇迹般地逐渐繁衍起来,一战时期达88头,二战时期达255头。二战时乌邦寺的主人认为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更危险,为了保护麋鹿,他们将麋鹿又疏散到世界上很多地方。

麋鹿还乡

新中国成立后,1956年英国伦敦动物园曾将两对麋鹿作为礼物赠给北京动物园。与欧洲动物园一样,这两对友好使者也未能繁育后代。

1979年,我国动物学家谭邦杰等人呼吁将流落海外的麋鹿引回中国,这一倡议得到英国方面的积极响应。1984年11月,英国乌邦寺当时的主人塔维斯托克侯爵决定,将22头麋鹿无偿赠送给中国。

麋鹿还乡,落户何方?中国各方面专家经过多方论证认为,无论是从历史文化的角度,还是从自然生态条件考虑,北京南郊的皇家猎苑旧址南

海子都是麋鹿回引的最理想地点。对此塔维斯托克侯爵也非常认同,他说,“能与中国合作让麋鹿重返故里,的确是一件极令人振奋的事情。”

南海子位于北京大兴区北部,与通州区、朝阳区、丰台区相邻,作为原先皇家园囿的“海子”(即水洼),大部分已被改作养鱼池,只有三海子中部隶属南郊农场的900余亩“湿地”还保留着原始自然的风貌,垂柳依依、荻花瑟瑟、蓼泽罗布、水气氤氲,只欠“呦呦鹿鸣”了。

1985年5月,北京市政府便在这里建成了麋鹿苑。1985年8月24日,22头麋鹿满载中英两国人民的友谊,乘坐专机从乌邦寺飞抵北京(其中2头运至上海),回到了老家大南海子。这样,流落他乡近一个世纪,历尽劫难的麋鹿终于踏上了故土。1987年乌邦寺又运来18头麋鹿;此后我国又在湖北石首和江苏大丰分别建立了麋鹿自然保护区。

33年过去了,重归故里的麋鹿野化成功,发展迅速,全国麋鹿已愈6000头。现在,全球麋鹿总数也愈7000头,再无绝种之虞。麋鹿的野化、繁殖也是中外携手拯救濒危物种的成功范例。



主讲人介绍:

郭耕,著名环保专家,自称“四不像”。北京南海子麋鹿苑博物馆、北京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中心副主任,副教授级高级工程师。环保社团“自然之友”理事,《野生动物》编委,著有《鸟兽物语——动物保护随笔》等系列科普著作。北京科普作协理事、自然之友理事。